

研究論文

探討香港電視新聞中的議程多元性： 本地、中國與國際新聞的比較

林宛瑩、李立峯

摘要

新聞議程是新聞內容中一個最重要的面向，它可以反映新聞工作者對新聞價值的判斷，又能夠影響公眾對於新聞事件和人物的重要性的認知。在這些前提下，本文討論香港電視新聞的議程多元性 (agenda diversity)。在概念上，本研究區分內部和外部多元性，並指出多元性可以在不同分析層次上測量。本文然後比較三家香港電視台的本地、中國和國際新聞的議程多元性。結果表示，當我們以每天的新聞報導為分析單位時，香港電視的國際新聞比中國和本地新聞有更高的議程多元性。然而，當議程累加起來時，國際新聞的多元性則明顯地降低。作者從不同類型新聞的生產過程以及新聞工作者對不同類型新聞的相對理解度來討論這些研究發現。最後，本文亦對香港以外不同國家的電視新聞中的議程多元性作出了初步分析。

關鍵詞：議程多元性，內部和外部多元性，分析層次，電視新聞，國際新聞和本地新聞比較

李立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為政治傳播、民意研究及媒體經濟。電郵：francis_lee@cuhk.edu.hk

林宛瑩，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為新媒體與青少年、網路運動及媒介效果。電郵：wanying@cityu.edu.hk

Exploring Agenda Diversity in Local, National, and Foreign News on Hong Kong Television

Wan Ying LIN

Francis L. F. LEE

Abstract

The news agenda reflects journalists' judgments of newsworthiness and influences the public's perceptions of the importance of issues, events, and actors. Whether various news outlets in a society set the same or different agendas would have important empirical and normative implications. This paper thus uses agenda diversity as the conceptual focus to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levision news in Hong Kong. The constructs differentiate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versity, as well as daily level and aggregate level diversity. They then compares agenda diversity of local, national and foreign news on three television st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compared to national and local news, foreign news has higher degrees of daily agenda diversity on Hong Kong television. The degree of diversity in foreign news reporting, however, is reduced to a larger extent when the daily agendas are aggregated. As a result, foreign news has lower degrees of agenda diversity at the aggregate level. The pattern is explained in terms of journalists' relative degrees of understanding of local, national and foreign affairs. Moreover, correlates of daily level agenda diversity are explored, and some preliminary analyses on the agenda diversity in television new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reported.

Keywords: agenda diversity, internal vs. external diversity, television news, foreign news, Hong Kong

議程設置是新聞工作的一個關鍵面向。在日常工作中，新聞工作者必須決定哪些故事應該報導，哪些應該省略，他們還得給新聞故事的重要性做出排序。議程設置有重要的社會功能，因為一般市民對公共事務少有直接的經驗和參與，他們需要仰賴新聞媒體告訴他們有甚麼問題需要和值得他們去關注。

但是，在一個社會中，不同的媒介機構是否會設定相同的新聞議程呢？新聞工作者在多大程度上會對某一個議題或具體的新聞事件的重要性有同樣的判斷呢？另外，新聞機構是否會對不同的議題作較平均的討論，抑或會將關注點集中到少量議題上呢？這些問題指向的是由不同議題 (issues) 或新聞類別所組成的新聞議程 (news agenda) 的多元程度。

這些問題對我們了解新聞的特徵以及新聞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有其重要性。首先，眾所周知，新聞媒介有議程設定的效應——新聞媒體對某一議題作越顯著報導時，公眾亦會傾向越重視該議題 (Takeshita, 2006)。但在一個社會中，新聞媒介作為一個整體會有多大的議程設定效應，卻可能會因議程多元化的程度而異。如果不同的媒介機構設定同樣的議程，又或者媒介將注意力高度集中於少量議題上，媒介的整體議題設定效應很可能會較大。

另外，從規範性 (normative) 的角度看，多元通常被認為是一件好事。如果不同新聞機構提供的新聞議程不一，市民就可以有所選擇。不過，亦有一些學者認為媒介有協助組織公眾討論，並凝聚社群共識的作用 (Blumler & Gurevitch, 1995)，而多元的議程則可能減弱媒介承擔這些社會功能的能力。正如 McCombs (1997) 指出，公眾、媒體，和政府沒有無限的資源和空間去討論所有公共事務。在一個特定的時間段內，公眾能認真討論的事情的數量其實很有限，這種有限性使得大眾更需要對「甚麼議題最為重要」這個基本問題取得共識。如果議程太過多元化，便可能會出現社會分裂 (social fragmentation) 的情況 (Katz, 1996)。

本文並非要在規範性理念的層面上討論多元性的問題。但基於以上的觀點和考量，本文用議程多元性作為一個概念切入點來審視香港電視新聞的一些特徵。本文發展出一個概念框架，對內部和外部多元

性以及不同的分析層次做出區分。本文繼而關注香港電視新聞中的本地新聞、中國新聞和國際新聞在議程多元性上有何不同。如此，本文除了可以展示香港的電視新聞的一些特徵之外，對新聞學研究主要做出兩方面的貢獻。首先，就議程多元性這概念，本文提出一個原創而較為系統的分析框架。第二，它在方法學的層次上探討不同的多元性概念的測量方法。誠然，這篇文章的討論較為探索性，但我們相信，在建立了議程多元性的概念和測量後，我們可以開展更多更有意義的分析。在文章的末段，我們會討論到一些未來研究方向的可能性。

議程多元性：內部外部之分及分析層次的問題

要分析電視新聞的議程多元性，我們要對一些相關概念作出區分及闡釋，並說明我們對議程多元性的定義。

首先要指出的是，在已經超過三十年的議程設置效果研究的傳統中，學者已經將議程設定這概念由原本只關注議程中有甚麼議題，發展到同時關注每一議題中的報導方式。後者亦即是所謂「第二層次的議程設定」(second-level agenda setting) (Golan & Wanta, 2001; McCombs, Lopez-Escobar, & Llamasm, 2000)，其關注點是媒介如何設定一事件或一個議題中各「屬性」(attribute)的重要性，而當媒介對不同的「屬性」的重要性有不同的排列時，媒介對該事件或議題的報導的整體意義便會不一樣，從而可能影響人們對事件或議題的態度。換句話說，傳統的議程設定關注媒介在報導甚麼，「第二層次的議程設定」關注媒介怎樣報導個別議題或事件。不過，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談論的議程設定只是集中在較傳統的意義，亦即媒介在報導甚麼之上。所以，本文中指的議程是由議題構成的，議程設定的重點在於一個新聞媒介有沒有將個別議題納入新聞議程當中，以及它如何排列不同議題的重要性。

由於本文只關注傳統意義下的議程設定，所以我們所指的「多元性」不是觀點或者意識型態的多元性，而純粹是議程多元性，亦即不同媒介是否報導同樣的議題或給予同樣議題同樣顯著性的問題(為免文字冗長，在下文我們會將「多元性」及「議程多元性」交換使用)。我們集中在傳統意義下的議程設定，一方面是因為是次研究中的資料所限，

另一方面是因為，單是傳統意義下的議程設定，就已經值得我們去深入分析。

事實上，在「第二層次的議程設定」被提出之前，不少學者就已經對傳統意義下的議程的多元性有各種分析。其中較重要的是 *nominal diversity* 和 *attributive diversity* 的區分。需要留意的是，雖然 *attributive diversity* 一詞用上了 *attributive* 一字，但 *attributive* 一字的意思並非指以上提及的「第二層次的議程設定」裏的「屬性」。根據 *nominal diversity* 和 *attributive diversity* 兩個概念的實際意義，我們可以將它們分別稱為「形式多元性」及「比例多元性」（Allen & Izcaray, 1988；McCombs & Zhu, 1995）。形式多元性所指的僅僅是在某一個時間點上被認為是重要的事件的數量，亦即是說，當一個人被問到他認為社會上有甚麼重要的議題時，如果那個人只提到一個議題，他的形式議題多元性就很低，如果那人提到多個議題，他的形式議題多元性就較高。這個概念通常被運用來審視一般市民大眾的議程特徵（如 de Waal & Schoenbach, 2008；Wanta, King & McCombs, 1995）。不過，一些研究亦曾嘗試測量新聞議程的形式多元性（如 Groshek, 2008；Peter & de Vreese, 2003）。至於比例多元性，則是指一個個體（無論是人或新聞機構）對不同議題的關注程度的分配，例如一個新聞機構的議程中可能有三個議題，但該新聞機構可以給予三個議題同樣顯著的報導，亦可以將大部分新聞空間放到其中一個議題之上。在前一種情況，該新聞機構便展示了較高的比例多元性。

雖然形式和比例多元性並不完全一樣，但它們也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兩者所涉及的問題都是一個實體本身的議程的內部多元性 (*internal diversity*)，而並不涉及不同實體的議程之間的外部多元性 (*external diversity*)。在新聞學研究中，內部和外部多元是兩個由來已久的概念 (Entman, 1989; McQuail, 1986, 1992)。這兩個概念通常被應用來描述傳媒對不同意見或者意識型態的報導。比如說，若一個社會中的媒介機構有很強的黨派屬性，亦即是說媒介系統中有高度的政治平行 (Hallin & Mancini, 2004)，不同媒介機構所表達的政治觀點便可能很不一樣，媒介之間便有很高度的外部多元性。但同一時間，每一個媒介機構本身卻不一定會容納很多不同的觀點。在這情況之下，每個媒體

自己的內部多元性就不高。應用到本研究的關注點中，如果一個媒體的議程包含多個議題，而且該媒體對各議題給予差不多的程度的關注，那麼該媒體的內部議程多元性就較高。相反，如果一個媒體的議程只包括少數議題，又或者該媒體將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一兩個議題上，那麼該媒體的內部議程多元性就較低。

至於外部議程多元性，簡單來說，就是指不同實體的議程之間的對應程度。在政治傳播學中，一些美國學者曾運用這個概念分析競選期間媒介議程和候選人議程的對應程度，亦即是說，媒介的選舉報導在多大程度上會強調候選人本身所關注和較多討論的議題(Hayes, 2009; Ridout & Mellen, 2007)。在新聞學中，亦有學者曾運用這概念研究跨媒介的議程設置，亦即是說一個有份量和地位的媒體機構的議程是否真的會影響其他媒體機構的議程(Roberts & McCombs, 1994)。相關的近期研究還有Groshek (2008)：他比較CNN和CNN International的新聞內容，發現兩個頻道對於同樣的新聞事件往往有不同的詮釋框架，不過兩個頻道的新聞議程卻非常相似，亦即是說，它們對議題的選擇非常接近，兩個頻道之間的外部議程多元性低。

正如之前已經提及，本文將探討香港電視新聞的內部及外部多元性。但除了內部和外部之分，本研究亦關注分析層次(level of analysis)的問題。具體地說，在本研究的背景中，所謂分析層次就是指我們其實可以用不同的時間段為單位，來為新聞報導計算其內部及外部的議題多元性。一方面，我們可以用「每日」為單位，計算每一天的電視新聞議程的多元程度，但我們亦可以將一個星期或一個月的新聞報導總合起來，以計算該星期或月份的議程多元性。單從邏輯上說，我們亦可以用一年或甚至更長的時段做單位。而在一個實證研究中，研究者亦可以將研究樣本作整體處理，先得出研究樣本的總議程，然後計算出新聞內容在累計層次上的多元性。

事實上，在傳統的議程設定效應研究中，研究者通常都會對研究樣本作整體處理，這種做法符合一般議程設定效果研究的需求。然而它掩蓋了一種可能性，就是一個新聞機構在一段時間內的總議程，可能是不同的每日新聞議程的整合的結果。舉例說，如果一個新聞機構每天重覆地報導五個議題，而每天它都將新聞空間平均分配給該五個

議題，那麼該新聞機構的總議程亦會是由五個各佔20%新聞空間的議題組成。用以上的概念語言來說，這個新聞機構每天的議程，以及累計起來的「總議程」都有很高的內部多元性。不過，同樣的總議程，也可以是新聞機構每天只報導一個議題，但在五天之內分別報導了五個不同議題的結果。在這情況下，新聞機構每天的新聞議程的內部多元性其實很低，但它的總議程的內部多元性卻仍然很高。同樣地，當我們研究新聞機構之間的外部多元性時，研究結果亦可能因分析層次而異。不同的新聞機構可以在任何一天都關注不同的事件，但是這種日常的差異有可能在總合和累計的過程中相互抵消，造成在總議程的層次上較低水平的外部議程多元性。

議程多元性在「累計」和「每日」這兩個分析層次上的差異不只是一種數學上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累計」和「每日」層次的議程多元性代表着具不同實質意義的新聞現象。事實上，通過文章往後部分的資料分析，我們將會看到，同時在不同分析層次上計算新聞議程的多元性，可以怎樣幫助我們了解新聞內容的特徵。

總括以上的概念解析，我們可以區別新聞議程的內部和外部多元性，而兩者均可以在每日或累計的層次上進行分析。將兩種區分結合起來，我們便得到一個 2×2 的概念框架。本研究將運用這框架去審視不同類型的電視新聞的議程多元性。

在闡釋具體的研究問題和假設之前，必須強調的一點是，新聞議程亦可以由不同範疇來建構。之前已提及，一些學者發展了由議題或事件的「屬性」來建構的「第二層次議程」這一概念。除此之外，亦有一小部分研究以其他範疇來建構議程。例如Wanta, Golan, 和Lee (2000)就分析新聞內容中的「國家議程」(country agenda)，Peter和de Vreese (2003)則提出「主題議程」(thematic agenda)的概念。另外，新聞議程亦可以被視為由每一個獨立的新聞故事所構成(Boczkowski & de Santos, 2007)。顯然分類系統的選擇可能會影響一個研究所發現的議程多元性的程度，但為了保持一個較為合適的研究範圍，文本所分析的只限於按照典型的議題劃分(如內政、國際政治、教育、健康、社會福利等)來建構的新聞議程。

研究問題和假設

在釐清了一些概念用語之後，我們可以設立用以引導數據分析的研究問題和假設。從最簡單的開始，第一個研究問題僅僅是描述性的：

RQ1：香港電視新聞中的本地、中國和國際新聞呈現多大程度的議題多元性呢？

如研究問題所示，我們會將本地(即香港)、中國，以及國際新聞分開。對香港的新聞機構而言，這三類新聞無論在重要性上、新聞價值的考量上，以至實際生產過程上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因此，這三類新聞的議程首先就應該各自不同，例如過往一些西方的國際新聞內容研究就指出，國際新聞往往集中於精英國家的政治社會狀況，至於發展中國家則經常是在有災難發生時才會受到關注(Galtung & Ruge, 1965; Chang, 1998; Chang, Shoemaker & Brendlinger, 1987; Hess, 1996)。同時，跟本文的焦點更直接相關的是，三類新聞的議程多元性也可能有所不同。

但我們能否就這三類新聞的議程多元性的相對程度建立更具體的假設呢？就內部多元性而言，我們認為國際新聞的多元程度，無論在每日抑或是累計的層次上，都很可能比本地和中國新聞的低。原因之一，是一個地方的電視台的主要受眾始終是一個「本地」的觀眾，所以電視新聞很可能會用較少的時間來報導國際新聞。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如果一個電視台在某一天的新聞中只有一篇國際新聞報導，那麼根據上一節討論過的定義而言，該天該電視台的國際新聞的內部議程多元性就是零。雖然這極端情況不會經常出現，但它顯示的是，當一類型新聞所佔的新聞空間較少的時候，該類新聞的內部多元性便很可能會較弱。

除此以外，本地的觀眾對於自己所屬的社會和國家，理應有更多方面的關注。這一方面可能是基於一種本土認同和意識，另一方面是因為不同範疇的本地事務，從教育到社會福利，從經濟到政治等，都有可能直接影響一個人的生活。相對之下，其他國家的公共事務和社會問題，不一定所有都會對本土觀眾有明顯影響。在面對國際新聞

時，本地觀眾會關注的，可能會侷限於幾種常見的議題（如災難、外國的選舉等）。如果新聞工作者也如此理解自己的受眾，他們所選擇出來的本地新聞就應該比國際新聞在議題上更多元化。

基於以上的原因，我們定下以下兩個研究假設：

H1：國際新聞在每日層次上的內部議程多元性比中國和本地新聞的要低

H2：國際新聞在累計層次上的內部議程多元性比中國和本地新聞的要低。

至於不同類型新聞的外部議程多元性的情況，則可能比內部多元性要複雜一點。我們認為，在每日的層次上，國際新聞的外部多元性很可能比本地和中國新聞的要高。能夠導致這結果的原因有二。第一，相比於對整個世界而言，新聞工作者對他們自己生活的社會和國家應更加熟悉。這並不是說新聞工作者對世界事務會完全無知，有些國家的新聞機構中，負責國際報導的記者對於國際事務可以瞭解得很多。但是他們對於全球性事務的了解很可能還是相對地不如負責本國新聞的記者對自己國家的瞭解來得深入和全面。對於國際事務相對較低水平的理解，意味着在日常工作中，在不同機構中工作的新聞工作者對哪一則國際新聞更值得報導可能不會有很強的共識（common sense），新聞選取過程有時甚至可能附帶一點隨意性。

第二，以上已經提過，一個本地的電視台很可能對本地新聞始終較為重視。在這情況下，電視台對本地及國家新聞的選取可能會較為深思熟慮。同時，新聞學研究中有「集體新聞」（pack journalism）這概念（Crouse, 1973），指的是由於新聞判斷並不是完全客觀及可以由科學方法得出的，新聞機構和新聞工作者往往會通過相互之間的溝通以及互相觀察對方的工作來驗證自己的判斷的確當性。通過這個過程，不同新聞工作者和機構的新聞判斷便會趨向統一，以本研究的概念語言來說，他們之間的外部議程多元性便會降低。不過，至少在香港，負責本地和中國新聞的記者有較多機會在日常「跑新聞」時跟其他機構中工作的同業互動，但負責國際新聞的記者和編輯卻不會經常有機會和在其他機構中工作的同業交往。同時，既然新聞機構和工作者較為重視本地和中國新聞，他們在觀察其他機構的工作以驗證自己的判斷

時，亦很可能更集中於本地和中國新聞，故「集體新聞」這現象應更大程度上可能適用於本地和中國新聞，亦即是說本地和中國新聞的外部多元性在「每日」這個分析層次上會較低。¹

但是當考慮到累計層次的外部多元性時，情況有可能會不一樣。雖然新聞工作者每天在選擇應該報導的國際新聞時可能有不同的判斷，但從長期來看，這些判斷之間的差異卻可能會相互抵消，因此會帶來在累計層次上較低的多元性。事實上，我們以上指出新聞工作者對國際事務的瞭解程度相對他們對本土和國家事務的瞭解程度很可能較低，這意味着存在於他們腦海之中的世界圖像，很可能比同時存在於他們腦海之中的本土社會和國家的圖像要簡單。我們在討論內部多元性時亦已指出，新聞工作者在處理國家和本地新聞時更有可能意識到大量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議題的重要性。相反，對於國際新聞而言，新聞工作者最後可能只關注在較狹窄的範圍內較小量的事件和議題(Norris, 1995; Seib, 2004)。所以，當我們把每天新聞報導中的國際新聞累計而得出不同新聞機構的總議程之後，這些個別新聞機構的總議程之間的外部多元性可能比中國和本地新聞的要低。基於上述論點，我們再定下以下兩個研究假設：

H3：國際新聞在每日層次上的外部議程多元性比中國和本地新聞的要高。

H4：國際新聞在累計層次上的外部議程多元性比中國和本地新聞的要低。

背景和數據

在談論研究數據的來源和分析方法之前，我們可先提供一些有關香港電視業及電視新聞的背景資料。在香港，電視廣播有約半世紀的歷史。1967年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亦即無線電視(TVB)成立後，適逢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商業電視廣播更是有長足的發展。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ATV)成為了香港兩家免費電視台，兩家機構都供應一個廣東話頻道和一個英文頻道。直到今天，免費電視仍然是大部分市民獲取資訊和娛樂的主要渠道，其中無線電視

一直在市場上佔主導地位。其每天傍晚六時半的新聞報導通常有超過150萬觀眾，而其他晚間黃金時段（在香港為七時至十一時）的娛樂節目的收視則更高，通常都可達至約30個收視點（即超過二百萬觀眾），一套受歡迎的電視劇的觀眾人數更往往達三百萬。相反，亞洲電視一直處於弱勢，其晚間黃金時段的娛樂節目往往只有不足十點的收視點。不過，亞洲電視的傍晚新聞在六點鐘開始，其觀眾人數亦通常接近或超過一百萬。

除免費電視外，香港政府在八十年代後期為了擴展社會的「傳訊基建」（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開始推動多頻道收費電視的發展（Lau, 1988, 1992）。而在這政策背景下，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在1994年開始其收費電視服務，以收取月費的方式向使用者提供八條頻道，其中包括香港首個24小時新聞台。在最初，香港政府給予有線電視三年的收費電視服務獨家專營權，這是因為收費電視的初始投資非常龐大，而且政府要讓有線電視這個先行者首先建立起收費電視的市場。事實上，習慣了不用金錢就可以看電視的香港市民，對收費電視絕不是一下子就接受，有線電視的業務發展亦比原本想像中緩慢（Lee, 2007）。因此，到了1996年，有線電視的獨家專營權獲得延續。一直到了2001年，香港政府才正式開放收費電視市場，引入競爭。

到了今天，香港總共有三個正式的收費電視服務牌照持有人，分別為有線電視、電訊盈科的NOW寬頻電視，以及無線電視有份持有的無線收費電視。到2008年，香港共有大約1,249,000個家庭有申請多頻道收費電視服務，佔全香港家庭數量約56.3%。²而在三家機構之中，有線電視憑着較長的歷史，配合有線寬頻的互聯網業務發展，在收費電視市場中仍稍佔領導地位，目前用戶超過90萬。到09年下半年，有線電視更表示有意申請免費電視服務牌照。

由於擁有24小時新聞頻道，在理論上而言，收費電視可以在節目的安排和製作上有更多的發揮空間。但現時香港的收費電視的新聞節目至少在形式、風格和長度上跟免費電視的新聞報導大同小異。其中有線電視的新聞報導長半小時，而該半小時的新聞節目會在新聞頻道上被重覆播放。這樣做固然有助於觀眾能在每日的不同時段都能收看一個綜合的新聞報導。事實上，由於收費電視的觀眾會在不同時段收

看其新聞報導，所以收費電視的新聞收視較難以計算。不過，一些調查研究發現新聞頻道應該是收費電視各類頻道中總收視最高的頻道(可參考Lee, forthcoming)。

所有以上提及的電視機構，無論是收費或是免費，都是商業性質的。免費電視以廣告作為最重要的收入來源，而收費電視的收入則包括廣告收益和顧客所交的費用。在政府政策上，它們都受到廣播事務管理局監管，除一般可能適用的法律外，監管的準則主要是廣播條例以及發牌時所附帶的發牌條件。例如香港政府在發牌給予一個免費電視台時，會清楚地要求該免費電視台最少要在黃昏一個特定時段中向市民提供一定時間量的有關新聞及公共事務的節目。直到目前為止，政府亦會要求免費電視台播放由香港唯一一個公營廣播機構「香港電台」(RTHK)所製作的教育或公共事務節目(但這規定可能在將來的公營廣播改革中被刪除)。至於香港電台本身，雖然機構中有電視節目製作的部門，但機構並沒有自己的電視頻道，而香港電台亦不會製作綜合性的新聞報導。

以下分析的資料來自於作者對無線、亞視及有線的主要新聞節目的內容分析：無線的是每天晚上的六點半新聞報導，亞視的是其六點鐘新聞，有線則是其八點鐘新聞。³無線和有線的新聞節目長30分鐘，中間包括一個廣告時段，另外，新聞後段的體育消息並沒有被包括在分析之中。⁴亞視的六點鐘新聞則長45分鐘，其中包括兩次廣告時間。

內容分析覆蓋了從2008年1月到3月期間的四個禮拜的電視新聞節目(1月20日到26日，2月10日到16日，3月2日到9日，3月23日到29日)。但是本研究的樣本錯過了2月10這一天的有線電視八點鐘新聞。換句話說，本研究總共分析了83個新聞節目。編碼體系包括一系列的關於新聞內容方面的問題，以個別新聞故事為基本單位。兩位經過訓練的學生助理負責編碼。為測量編碼者之間的效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我們在83個新聞節目中以系統抽樣方式選取了9個節目，讓兩位助理同時進行編碼。結果顯示，在以下分析中出現的變項都達到了可以接受的效度(Scott's π 大於.80或簡單同意度大於.90)。

表一：香港電視新聞中本地、中國和國際新聞的比例

	亞視	無線	有線	合計
新聞故事數量				
本地新聞	8.07	7.54	5.41	21.01
中國新聞	4.40	2.61	2.41	9.41
國際新聞	3.25	2.63	5.96	11.84
總長度				
本地新聞	1040.5	691.6	421.2	2153.4
中國新聞	471.0	283.5	206.8	961.4
國際新聞	251.8	183.5	484.9	920.2

註：新聞故事數量指每天新聞報導中有多少則新聞故事屬本地、中國或國際新聞。總長度以秒為單位。輸入的數字是每天的平均值。當計算總和時，被錯過的有線新聞節目的值被平均值所取代。N = 28.

在進入對議程多元性的分析之前，表一總結了三個電視台的本地、中國，以及國際新聞的比例。並不出奇的是，無線和亞視同樣地給予最多的新聞時間予本地新聞，然後是中國新聞。以總長度及百分比計算，亞視的新聞報導中本地新聞佔了59.0%的新聞時間，中國新聞則佔了26.7%的新聞時間。國際新聞只佔14.3%的新聞時間。無線的「本地傾向」更重，三類新聞所佔的新聞時間分別為59.7%、24.5%和15.8%。相比之下，有線的八點鐘新聞中，國際新聞佔的時間多達43.6%，而本地和中國新聞所佔的時間比例只有37.8%和18.6%。從這點看，有線新聞的八點鐘新聞似乎有意通過更多關注國際新聞把自己和其他兩家免費電視台較早一點播放的新聞節目區分開來。不過，我們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才能確定這種產品或市場區分 (product or market differentiation) 背後的邏輯，以及在有線新聞台24小時不停的新聞節目中，這對國際新聞的重視到底有多普遍。

內部議程多元性

現在我們可以以從內部多元性開始，正式探討新聞議程多元性。如前所述，一些研究者發展了形式多元性和比例多元性的概念，而這兩者都和我們所指的內部議程多元性相關。如果我們根據形式多元性的路徑來計算內部議程多元性，我們只需要計算每天被呈現在新聞節目中的議題的數量(在累計的層次上就是四個禮拜的新聞節目所覆蓋到的議題的數量的總和)。如果我們根據比例多元性的路徑來計算，我們就要考慮到屬於不同議題的新聞所佔的比例。本研究遵從比例多元性的路徑，因為這概念對數據中的資訊有更充分的使用。另外，由於大部分議題都很可能至少被偶爾報導，當我們從累積的層次來測量內部多元性時，計算形式多元性就未必很有意義和區分性。

更具體地說，在內容分析中，所有的新聞故事都按照其所屬的議題被編碼。編碼表中列出了總共25個主要議題範疇，如國內政治、國際關係、社會福利及健康、內部秩序等等。需要承認的是，這25個主要議題範疇的劃分並沒有很強而有力的理論基礎，嚴格來說，「議題範疇」和傳統議程設定研究中的「議題」有一定的差異，如「國內政治」這範疇，就可以包含很多不同的議題。不過，要將每一個議題都作嚴格和清晰的劃分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仍沿用編碼表中的25個主要議題範疇為分析的基礎。

每一個新聞故事最多可屬於這25個議題範疇中的三個。當進行編碼的時候，我們指示兩位編碼員去特別留意每一個新聞故事的「第一個議題」是甚麼。換句話說，我們要求編碼員明確地考慮，如果某個新聞故事只能被編碼為從屬於一個議題範疇的話，那它會屬於哪個範疇。相比之下，有關新聞故事的第二和第三議題的編碼就相對寬鬆，而且並不是每個新聞故事都有第二和第三議題範疇。因此，當計算議程多元性的時候，我們只關注新聞故事所屬的第一議題。

為了在每日的層次上計算內部議程多元性，我們首先合併了三家電視台28天中每天的本地、中國和國際新聞的議程。然後，跟從過往研究(Culbertson, 1992; McCombs & Zhu, 1995)，我們用「熵公式」(entropy formula)來計算內部議程多元性。該公式是：

$\sum -p_i * \ln(p_i) / \ln(25)$ ， p_i 指落入 i 這個範疇的新聞故事的百分比

這個公式的分母是 $\ln(25)$ ，因為本研究中總共有 25 個議題範疇。運用這個分母可以將最後得出的值被標準化為 0 到 1，0 代表了完全的集中（當 100% 的新聞故事都落入同一個議題範疇的時候），而 1 則代表了完全的多元性（當 25 個議題範疇完全平均地各佔 4% 的新聞時間的時候）。

表二：1月20日電視新聞的內部議程多樣性

	本地新聞	中國新聞	國際新聞
議題範疇			
本土政治	12.0		33.33
國際政治			8.33
軍事和國防			
本土秩序	32.0		8.33
經濟		27.27	
勞動和工業關係	20.0	9.09	
商業，工業	4.0	9.09	
交通			
健康，福利和社會服務	4.0		8.33
人口	4.0		
教育			
傳播	8.0		
房屋			8.33
娛樂			
能源			
科學和技術	4.0		
社會關係	4.0		
意外和災難		36.36	8.33
體育		18.18	

(續上頁)

文化	4.0		8.33
時尚			
慶典	4.0		
人情趣味			8.33
天氣			
宗教			8.33
故事總和	25	11	12
內部議程多元性數值	0.635	0.456	0.628

註：本表所列的議程是1月20日的。輸入的數字表示，在某一個類型的新聞中從屬於某一個特定的議題範疇的新聞故事的百分比。

表二具體地闡釋這個計算過程。它呈現了1月20日當天三家電視台經過合併的本地、中國、和國際新聞議程。舉例說，當天三家電視台總共播放了25個本地新聞故事，其中四個故事屬「本地政治」(12.0%)，8則新聞屬於「本地秩序」(32.0%)，如此類推。將這些百分比放到公式內作運算，1月20日那天本地新聞的內部議程多元性的數值是0.635。用同樣的方法計算，同一天中國新聞的內部議程多元性的值是0.456，而國際新聞則是0.628。

我們用同樣的方法來計算其他27天的本地、中國和國際新聞的內部議程多元性。最後，某一類型的新聞在累計層次上內部議程多元性，就是28個每日層次上的內部議程多元性的平均數。表三呈現了28天加起來的「總新聞議程」和累計層次上的內部議程多元性的數值。

表三：累計層次上的內部議程多元性

	本地新聞	國內新聞	國際新聞
議題範疇			
本土政治	7.33	25.65	25.82
國際政治	0.31	4.46	7.14
軍事和國防	0.31	1.12	5.22
本土秩序	19.34	10.41	16.76
經濟	13.57	6.32	1.37
勞動和工業關係	2.03	0.74	0.55
商業，工業	6.71	7.06	2.47
交通	4.68	4.09	3.85
健康，福利和社會服務	10.92	2.23	2.75
人口	0.78	0.37	0.0
教育	3.43	0.37	0.27
傳播	2.96	1.12	2.20
房屋	3.12	0.37	0.27
娛樂	3.43	1.12	1.37
能源	0.0	0.37	0.0
科學和技術	0.16	0.74	3.85
社會關係	0.78	0.0	1.37
意外和災難	9.98	14.50	8.52
體育	1.56	8.92	1.37
文化	2.34	1.86	1.65
時尚	0.16	0.0	0.0
慶典	1.25	1.12	0.82
人情趣味	3.43	5.20	11.54
天氣	1.25	1.12	0.0
宗教	0.16	0.74	0.82
故事總數	641	269	364
內部議程多元性數值	0.814	0.766	0.751

註：輸入的數字表示，在某一個類型的新聞中從屬於某一個特定的議題範疇的新聞故事的百分比。加粗的數字表示每類型新聞中最常被報導的議題。

如表三所示，在香港電視新聞的本地新聞中，三種被報導得最多的議題是本地秩序、經濟，以及「健康、福利和社會服務」。這三種範疇佔據了所有新聞故事的43.83%。相反，對中國新聞而言，大約四分之一的新聞故事是關於「本土政治」的。「意外和災難」大約佔了中國新聞故事的14.5%，「本地秩序」佔了10.41%。因此三種最常被報導的議題範疇總共佔據了中國新聞的50.56%。同時，「本土政治」和「本地秩序」也構成了國際新聞中最常被報導的議題範疇，他們分別佔據了25.82%和16.76%。緊跟着這兩類的是「人情趣味新聞」(human interest stories)，這類型佔據了國際新聞故事的11.54%。這三種題目加起來總共佔據了所有國際新聞的54.12%。事實上，這些百分比已經表明國際新聞看起來更多的集中於最常被報導的話題(54.12% vs. 50.56%和43.83%)。換句話說，國際新聞在累計層次上的內部議程多元性要比另外兩類新聞的要低一點。根據「熵公式」計算出來的內部議程多元性的數值確認了這一點，因為國際新聞的數值最低，只有0.751，而本地和中國新聞的值分別是0.814和0.766。

這個發現跟假設H2基本吻合，雖然嚴格來說我們並沒有提供一個統計測試，因為三個累計層次的內部議程多元性數值只是三個個別的分數而已。但是，當我們關注每日層次的內部議程多元性時，統計測試是有可能的。我們的分析發現，對本地新聞而言，28天的內部議程多元性的平均值是0.49 (S.D. = 0.157)。而對中國和國際新聞來說，相應的平均值分別是0.40 (S.D. = 0.099)和0.50 (S.D. = 0.093)。跟假設H1相反，國際新聞看來有最高的每日層次的內部議程多元性。雖然明顯地國際新聞和本地新聞的數值的差異微不足道，但配對樣本t檢測顯示，中國新聞和國際新聞的內部議程多元性在每日的層次上有統計學上顯著的差異($t = 4.61, p < .001$)。換句話說，國際新聞的內部多元性，在每日的層次上，的確比中國新聞的要高。

外部議程多元性

現在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外部議程多樣性。跟內部議程多元性相似，外部議程多樣性也有不止一種測量方法。議程設置效果傳統中很

多研究都採取 Spearman rho 相關係數作為測量兩個議程之間的關聯程度的手段。Spearman rho 係數當然有其優勢，因為每一個係數都可以被測量出它的統計學意義來。但是，它的不足在於它只關注一個議程裏不同事件和話題的總體排名，因而犧牲了很多資訊，尤其是在一個議程裏不同事件所佔的注意力的實際比例有多少。

相比之下，Sigelman 和 Buell (2004) 的「議程融合係數」是一個對不同議題在議程中所佔比例較為敏感的測量方法。這個係數近年已被很多政治傳播學者採納，用來在選舉研究中檢驗媒介和候選人的議程的融合 (Hayes, 2009)。它的計算方式可以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闡明。假設現在有兩個媒介機構，而在新聞議程裏有四個議題。媒介組織 A 花了 25% 的新聞版面給予每一個議題，媒介組織 B 則花了 50% 的新聞版面給第一個議題，20% 給第二個，而剩下的兩個議題則佔 15%。在這種情況下，議程融合的數值是：

$$100\% - (|50\% - 25\%| + |20\% - 25\%| + |15\% - 25\%| + |15\% - 25\%|) / 2 \\ = 75\%$$

注意這個公式的後半部分，是兩個媒介機構給予每一個議題的新聞版面比例的差異的總和。這個總和被除以 2 之後，就會變成由 0 到 1 不等的數值，而這數值就可以代表兩個議程之間的多元化的程度。Sigelman 和 Buell (2004) 用 100% 來減掉這個總和，是因為他們關注的是關於「融合」而非「多元」的測量方法。對我們的研究而言，公式的第一部分可以省略。

另外，Sigelman 和 Buell (2004) 的公式關注的是兩個議程之間的融合和差異程度，但是當前的研究關注三個電視台。因此，當計算外部議程多元性時，我們首先計算了每一對電視台組合的議程多元性數值 (即亞視/無線、無線/有線、亞視/有線)，最後得出來的外部議程多元性是這三對組合的多元性的平均值。

表四：三家電視台的累計國際新聞議程

	亞視	無線	有線
議題範疇			
本土政治	23.81	28.04	25.65
國際政治	11.11	8.41	5.76
軍事和國防	4.76	6.54	4.19
本土秩序	20.63	12.15	18.32
經濟	1.59	2.80	0.52
勞動和工業關係	1.59	0.00	0.52
商業，工業	0.00	3.74	2.62
交通	1.59	2.80	5.24
健康，福利和社會服務	1.59	0.00	4.19
人口	0.00	0.00	0.00
教育	0.00	0.00	0.52
傳播	0.00	0.00	4.19
房屋	1.59	0.00	0.00
娛樂	1.59	0.93	1.05
能源	0.00	0.00	0.00
科學和技術	3.17	5.61	3.14
社會關係	0.00	0.93	2.09
意外和災難	11.11	11.21	6.28
體育	1.59	2.80	0.52
文化	1.59	0.93	2.09
時尚	0.00	0.00	0.00
慶典	0.00	2.80	0.00
人情趣味	12.70	9.35	12.57
天氣	0.00	0.00	0.00
宗教	0.00	0.93	0.52

註：輸入的數字表示，在某一個類型的新聞中從屬於某一個特定的議題範疇的新聞故事的百分比。加粗的數字表示每個電視台中最常被報導的五個議題。

為了演示這個計算過程，並同時提供一些關於香港電視上國際新聞的描述性資料，表四提供了三家電視台的國際新聞總議程。粗略地看這些資料，我們就能感到三家電視台的國際新聞議程在累計的層次上很相似。實際上，三家電視台報導得最多的五個國際新聞議題範疇都是「本土政治」，「本土秩序」，「國際關係」，「意外和災難」，以及「人情趣味新聞」。

基於這些百分比，我們計算出來的無線和亞視之間的多元性數值是41.21，無線和有線之間的數值是47.37，亞視和有線之間的數值是37.10。國際新聞在累計層次上的外部議程多元性就是三個數字的平均數，亦即是41.89。

用同樣的程式和步驟，可以發現本地新聞在累計層次上的外部議程多元性是49.71，中國新聞在累計層次上的外部多元性更高達58.66。跟累計層次的內部多元性一樣，我們無法測試這三個數值之間的統計差異。不過，至少從數值上來說，跟H4的設想一致，在累計層次上，國際新聞的外部議程多元性比中國新聞和本地新聞的要低。

那麼，在每日層次上的外部議程多元性呢？表五總結了相關的發現。如果我們集中看個別類型的新聞，我們可以見到，亞視和無線之間的議程差異，無線和有線之間的差異，以及有線和亞視之間的差異是不相伯仲的。換句話說，無論是本地、中國抑或是國際新聞的議程，沒有哪一個電視台特別不同於其餘兩個電視台。

表五：每日層次上的外部議程多元性

	平均值	標準差
本地新聞		
亞視/無線	54.17	11.27
無線/有線	53.84	20.38
亞視/有線	59.25	13.54
平均值	55.57 _{ab}	11.23
中國新聞		
亞視/無線	65.08	23.61

(續上頁)

無線/有線	69.09	36.26
亞視/有線	66.22	23.83
平均值	65.54 _a	19.58
國際新聞		
亞視/無線	60.60	26.19
無線/有線	66.84	23.29
亞視/有線	66.53	20.31
平均值	64.23 _b	18.77

註：輸入的數字是在每日層次上的外部議程多元性的平均值。在配對樣本T測試中，在 $p < .05$ 的水準下，帶有下列「a」的資料顯著地區別於彼此。在配對樣本T測試中，在 $p < .06$ 的水準下，帶有下列「b」的資料顯著地區別於彼此。N = 28。

更為重要的是，國際新聞的平均每日外部議程多元性數值是64.23，比本地新聞的相應數值(55.57)要高。這個差異在配對樣本T檢測中僅僅未能達至統計學上的顯著程度($p < .06$)。但考慮到在這個每日層次的分析中，實質樣本量只有28，一個 $p < .06$ 的發現其實已經非常值得留意。不過，中國新聞在每日層次上的外部議程多元性數值也很高(65.54)。而在統計學上，在配對樣本T測試中，這個數值也高於本地新聞的相應數值。因此，H3在這裏只得到了部分支持。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表五的數值比之前報告的在累計層次上的外部議程多元性數值要高。這並不奇怪。本文之前也討論過，當四個禮拜的每日議程累加起來的時候，三家電視台在每日層次上的差異可能會有部分被相互抵消掉。事實上，通過觀察每日層次和累計層次的議程多元性之間的差異，我們可以看到多元性在大多程度上會在累加過程下被減低。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看到國際新聞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它在累加過程中，外部多元性減少得最多：在累計層次上的外部多元性數值有41.89，而在每日層次上的外部多元性數值則是64.23，兩者之間的差異是22.34。相比之下，中國新聞在累加過程中，外部多元性的下降只有6.87(65.54減去58.66)，而本地新聞的相應數字則是5.86(55.57減去49.71)。

討論

本文運用議程多元性這個概念作為焦點，探討了三家香港電視台的本地、中國和國際新聞的特徵。本研究發展了一個 2×2 的概念框架，測量了三類新聞在每日和累計層次上的內部和外部多元樣性的程度。必須承認，由於研究只關注於香港這一個地方，我們很難就香港電視新聞的議程多元性的高低與否下結論。舉例說，只看數值的話，香港電視新聞在累計層次上看來有很高程度的內部議程多元性，因為本地、中國和國際新聞的數值分別是0.814, 0.766, 和0.751（基於0-1量表）。但是，這些高分數可能是因為這個研究運用了一個共包括25個範疇的議題分類系統。同時，當四個星期的新聞節目累計起來的時候，一個可觀程度的內部議程多元性是可以預期的。

不過，本文通過將本地、中國和國際新聞互相比較，發現一些三類新聞之間的差異。首先，我們發現在「每日」這個分析層次上，國際新聞的內部多元性較中國及本地新聞為高，亦即是說，在一天的新聞報導之中，三家電視台的國際新聞加起來時，所涉及的議題往往比同一天裏中國新聞及香港新聞所涉及的議題更為廣泛。但在累計的層次上，國際新聞的內部多元性卻較中國及本地新聞為低，亦即是說，當我們將幾個星期的新聞報導合併時，我們會發現國際新聞所涉及的議題並不及得上中國及香港新聞的多元化。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有關外部議程多元性的分析中。香港電視的國際新聞偏向於在每日層次上顯示出更多的外部議程多元性，確切點說，在一天的新聞報導中，三家電視台的國際新聞議程之間的差異，通常要比三家電視台的本地新聞議程之間的差異要大。但在累計層次上，三家電視台的國際新聞的議題分佈卻非常接近，它們的國際新聞的外部議程多元性在累計層次上比中國及香港新聞的較小。

正如我們在概念部分指出，我們認為這些結果，至少一部分是基於新聞工作者對國際事務的認知以及香港新聞機構製作國際新聞時的流程所致。一方面，香港的新聞工作者對國際事務的認識很可能不及他們對本地和中國事務的認識深入。此外，在製作過程中，在不同新聞機構中從事國際新聞工作的記者和編輯未必有很多交往和互動的機

會，結果是不同機構中的新聞工作者對個別國際新聞故事的新聞價值判斷有更大的差異。這導致了在每日的層次上，國際新聞的外部議程多元性較高，而由於三家電視台在同一天的國際新聞可能報導着不同的議題，所以當三家電視台的國際新聞加起來時，其內部議程多元性亦較高。相反，新聞工作者對不同的本地和中國事務的新聞價值較有「共識」(common sense)，所以在每天的新聞工作中，不同的新聞機構往往得出相類似的本地和中國新聞議程，因此後兩種新聞的每日層次的議程多元性較低。

但另一方面，如果新聞工作者對於世界事務相對地缺乏認識，他們腦海中的有關世界的圖像也可能相對簡單。同時，由於在國際間或在個別其他國家中發生的事情，很多時候都的確未必跟本地觀眾的生活和利益有非常明顯和直接的關係，長遠來說，會被香港新聞機構報導的國際議題很可能會較為狹窄。正如表三所顯示，報導本地新聞時，有關香港經濟的新聞佔頗為重要的份量，而各社會議題，如勞工問題、交通、社會福利、教育，和房屋問題等，跟香港人的日常生活都息息相關，所以在議程中都佔一定的位置。但在國際新聞中，這些經濟和社會議題都不會受到很大程度的重視。事實上，在364篇被編碼的國際新聞當中，談論外國教育問題的只有一則，談論外國的房屋問題的亦只有一則。這就解釋了為甚麼國際新聞的議程多元性在累計層次上較弱。

在文章開首的部分，我們曾經指出，議程多元性不單可以用來描述新聞內容的一些特徵，它亦具有規範性的意義。在累計層次上較低的外部議程多元性，代表的是一般香港市民無論觀看那一家電視台的電視新聞，其所獲取的國際新聞的議程是大同小異的。不同新聞機構之間的議程的劃一可以是一件好事，因為它可以令一個社會中的人對不同事情的重要性有共同的認知。但在累計層次上較低的內部議程多元性卻大概不是一件好事，因為它顯示的是，就算我們將幾個星期的國際新聞加起來之後，某些國際或其他國家中出現的議題都是很少被報導的。長遠來說，議程缺乏多元性會影響觀眾的國際社會的了解程度。

必須承認的是，本文對議程多元性的分析只是在一個探索的階段。而作為一篇獨立的研究文章，本文亦有幾個限制。首先，本文只

關注傳統意義下的議程設定，而未來的研究可以以其他單位，如議題內的屬性，來建構「新聞議程」。第二，正如在分析時指出，本文用以建構議程多元性的單位，嚴格來說是如內政或外交等較廣的「議題範疇」，而非一般意義下較為狹窄的個別議題。第三，由於我們的分析只集中於一個地區的電視新聞上，在累計層次上的新聞議程多元性的分析並未能用上統計學的驗證工具，這亦影響結論的說服力。不過，以上都是在資源及研究本身的限制下無可避免的，未來的研究可以彌補這些弱點。總的來說，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可供系統研究的概念框架，以及建立對不同的多元性概念的測量方式。而以上的分析可算是成功地達到了這些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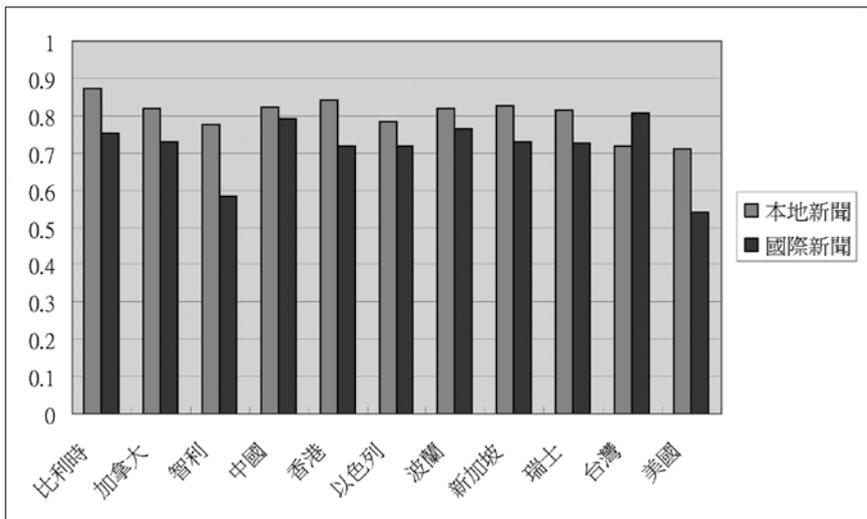
而在建立了這些概念和測量之後，在將來的研究中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探討有關議程多元性的問題。其中一個可能的路向，就是檢視甚麼內容因素跟每日的新聞的多元性程度有關係。例如在本地及中國新聞方面，如果在一天之中有越多跟政府直接相關的新聞，那一天的議程多元性會否較低呢？亦即是說，政府新聞會否令新聞機構聚焦在同一一些議題之上？同樣地，在國際新聞方面，一些學者指出傳媒的國際新聞往往集中在暴力和衝突之上，那麼我們其實可以預期，如果在一天之中有越多有關衝突和暴力的國際新聞，該天不同的電視台就可能聚焦在該些新聞故事之上，以致國際新聞在該天出現較低的多元性。全面進行這些分析超出了本文的範圍，但我們自己進行了一些初步數據分析，發現一天的國際新聞中有關衝突的新聞故事的數量，的確跟國際新聞在每日層次的內部以及外部議程多元性都有統計學上顯著的負相關（相關係數分別為 -0.41 和 -0.47 ， $p < .05$ ）。這既印證了國際新聞對衝突和暴力的偏好，亦展現了本文中所使用的議程多元性的測量的建構信度 (construct validity)。

另一方面，我們亦可更深入分析及討論本地新聞及國家新聞的分別。本文的分析着重國際與國內/本地之分，但進一步分析，我們會發現香港電視的中國新聞的議程多元性亦有其自己的特點：其累計層次的內部多元性、每日層次的內部多元性，和每日層次的外部多元性都較低，只有累計層次的外部多元性特別高。這顯示了香港電視的中國新聞的一些特質，而這些特質亦很可能跟中國新聞的來源問題、香港

傳媒機構對中國新聞的取態等有關。但詳細討論這些特質和關係在本文的範圍以外。

最後，另一個未來研究的延伸路向，當然是一些跨國的比較。本研究是一個跨國國際新聞研究的一部分，而從跨國數據庫中，我們可以得出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新聞的內部和外部多元性。雖然一個全面的跨國比較分析並不是本文的目標，我們還是可以彙報一下一個初步分析的結果。圖一顯示了11個國家或地區的本地和國際新聞在累計層次上的內部議程多元性。由於「本地」和「本國」新聞之間的分野對大部分國家來說並不那麼重要。同時，研究計劃中，很多國家只有兩個電視台的新聞被編碼，所以我們為建構圖1重新計算香港電視新聞的內部多元性數值，在重新計算中只包括無線和亞視新聞，並將「本地」和「中國」新聞合併。

圖一：11個國家的本地和國際新聞的累計層次內部議程多元性



如圖所示，香港跟其他國家比較，其本地新聞的累計內部多元性是稍高的：重新計算的數值是0.843，在11個國家中只有比利時的電視新聞有更高的內部多元性（數值為0.871）。但香港電視的國際新聞的累計內部多元性則較低：重新計算的值是0.718，只有美國和智利的電視

新聞得出更低的數值（兩者均低於0.6）。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之前的分析已指出，香港電視上本地新聞的累計內部多元性比國際新聞的要高。而圖一顯示，這發現也普遍適用於其他國家，唯一例外的是台灣。無論如何，圖一的發現可以引導我們去思考一些問題：為甚麼某些國家的國際新聞的內部議程多元性比另一些國家高？為甚麼大部分國家的本地新聞的累計內部多元性都要比國際新聞的高，但個別地方卻可能成為例外呢？

不同國家之間的差異，可以讓我們避免一種「距離決定論」，我們本文就國際及本地新聞的比較，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從香港媒體的環境出發。我們並非要指出國際新聞和本地新聞之間一定有一些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分別。所以，在分析不同國家之間的差異時，我們一方面可以留意不同國家的新聞媒體的運作邏輯和新聞製作過程上的差異，另一方面可以留意更廣義的社會、文化，及政治環境對新聞內容可以構成甚麼樣的影響（這亦正是聚焦於單一國家或地區的研究不能處理的問題）。這些問題可以藉由以後的研究嘗試解答。

註釋

1. 誠然，pack journalism只是一個概念化了的現象。它指向令不同機構的新聞內容產生催同現象的原因。在新聞生產中，固然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而另外的因素可能令不同機構的新聞內容趨異。我們在這裏只特別提到 pack journalism，是因為它有助我們得出與本研究有關的假設。至於 pack journalism在香港新聞界到底有多嚴重，是需要其他經驗研究引證的問題。
2. 資料來自亞洲有線及衛星廣播協會網站：<http://www.thepowerofpaytv.com>。
3. 有線新聞台全日不停播放，所以較難斷定那個報導最重要，我們最後選取了稍為後於無線六點半和亞視六點鐘新聞播出的有線八點鐘新聞。
4. 三家電視台對體育新聞的處理有所不同。無線將體育新聞放在綜合新聞報導中的後段。亞視的六點鐘新聞則並不包括體育消息（體育消息出現另一個獨立的節目之中）。有線新聞的處理手法介乎無線和亞視之間：體育消息在「體育快訊」中被報導，但體育快訊及新聞報導之間並沒有廣告時間，所以「體育快訊」仍可以被視為綜合新聞報導的一部分。在這情況下，為保持三家電視台的可比性，我們在分析無線和有線新聞時並不包括它們的

體育新聞時段。但如果一則體育新聞並非在平常的體育新聞時段內，則會被包括在內容分析之中。

參考文獻

- Allen, R. L., & Izcaray, F. (1988). Nominal agenda diversity in a media-rich, less-developed societ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5 (1), 29–50.
- Blumler, J. G., & Gurevitch, M. (1995). *The crisis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 Boczkowski, P. J., & De Santos, M. (2007). When more media equals less news: Patterns of content homogenization in Argentina's leading print and online newspaper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4 (2), 167–180.
- Chang, T. K. (1998). All countries not created equal to be news: World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5 (5), 528–563.
- Chang, T. K., Shoemaker, P. J., & Brendlinger, N. (1987).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med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4 (4), 396–414.
- Crouse, T. (1973). *The boys on the bu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Culbertson, H. M. (1992). Measuring agenda diversity in an elastic medium: Candidate position papers. *Journalism Quarterly*, 69 (4), 938–946.
- De Waal, E., & Schoenbach, K. (2008). Presentation style and beyond: How print newspapers and online news expand awareness of public affairs issue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1 (2), 161–176.
- Entman, R. (1989). *Democracy without citize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ltung, J., & Ruge, M. H. (1965).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new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Congo, Cuba and Cyprus crises in four Norwegian newspaper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 64–91.
- Groshek, J. (2008). Homogenous agendas, disparate frames: CNN and CNN international coverage onlin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2 (1), 52–68.
- Golan, G., & Wanta, W. (2001). Second-level agenda setting in the New Hampshire primary: A comparison of coverage in three newspapers and public perceptions of candidat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8 (2), 247–259.
- McCombs, M., Lopez-Escobar, E., & Llamas, J. P. (2000). Setting the agenda of attributes in the 1996 Spanish general elec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0 (2), 77–92.
- Hallin, D., & Mancini, P. (2004).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yes, D. (2009, forthcoming). The dynamics of agenda convergence and the paradox of competitiveness in presidential campaign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 Hess, S. (1996). *International news and foreign correspondent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Katz, E. (1996). And Deliver Us from Segment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46 (1), 22–33.
- Lau, T. Y. (1988). Introducing cable television into Hong Ko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12 (4), 379–392.
- Lau, T. Y. (1992). From cable television to direct broadcast satellite: Emerging policy issu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16 (7), 576–590.
- Lee, F. L. F. (2007). Development of pay television in Hong Kong: History, audience consumption,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sian Development*, 4 (2), 247–272.
- Lee, F. L. F. (forthcoming).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viewing preferences on television consumption in the era of multichannel service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 McCombs, M. (1997). Building consensus: The news media's agenda-setting role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4 (4), 433–450.
- McCombs, M., & Zhu, J. H. (1995). Capacity, diversity, and volatility of the public agend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9 (4), 495–525.
- McQuail, D. (1986). Diversity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ts sources, forms and future. In P. Golding, G. Murdock, & P. Schlesinger (Eds.), *Communication politics* (pp. 133–149).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cQuail, D. (1992). *Media performanc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London: Sage.
- Norris, P. (1995). The restless searchlight: Network news framing of the Post–Cold War worl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2 (4), 357–370.
- Peter, J., & de Vreese, C. H. (2003). Agenda-rich, agenda-poor: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of nominal and thematic public agenda divers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5 (1), 44–64.
- Ridout, T. N., & Mellen, R. (2007). Does the media agenda reflect the candidates' agenda?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2 (2), 44–62.
- Roberts, M., & McCombs, M. (1994). Agenda-setting and political advertising: Origins of the news agend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1 (3), 249–262.
- Seib, P. (2004). News coverage of global inequalities; Journalism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USA, September 2004.
- Sigelman, L., & Buell, E. H. Jr. (2004). Avoidance or engagement? Issue convergence in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s, 1960–2000.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 650–661.
- Takeshita, T. (2006). Current critical problems in agenda-setting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8 (3), 275–296.

- Wanta, W., Golan, G., & Lee, C. (2004). Agenda setting and international news: Media influence on public perception of foreign nation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1 (2), 364-377.
- Wanta, W., King, P. T., & McCombs, M. E. (1995). A comparis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issue diversity in the US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7 (4), 353-365.